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性别偏好

——基于深圳调查的研究*

李树苗 伍海霞 靳小怡 费尔德曼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中国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定量研究了农民工的性别偏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仍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特征;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中国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和原因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城镇; 农村; 流动人口; 性别偏好; 性别比; 社会网络

【作者简介】李树苗,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伍海霞,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靳小怡,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费尔德曼,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710049

1 研究背景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孩偏好观念是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Zeng et al., 199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地区。研究发现,一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男孩偏好观念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地区后其出生性别比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偏高态势(伍海霞等,2005);另一方面,进入城镇后,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工重新构建着个体的社会网络,在网络成员观念与行为的影响下,个体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将发生转变(Carrington, 1988;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Kohler et al., 2001),进而也必将对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在城镇农民工规模逐年扩大的现实情况下,探讨流动后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入认识人口流动对城镇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寻求降低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有关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生育控制行为等的研究发现,流动后与社会网络成员的信息交流与互动,有助于流动人口理想初婚年龄的上升、生育控制行为从不避孕向避孕、传统控制方法向现代控制方法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流动人口观念与行为的变迁(杨绪松等,2004;靳小怡等,2005;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Sara and Abigail, 1997; Eklund, 1999; Kohler et al., 2001)。截止目前,虽然已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流动人口性别偏好的研究,指出人口流动有利于流动人口男孩偏好观念的转变,但尚未量化地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民工的男孩偏好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杨瑛等,2002; 尤丹珍和郑真真,2002; 洪旺全,2005)。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4月在中国深圳市进行的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在分析流动后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和行为的基础上,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将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社会网络、流动等因素对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 本文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号05ARK001和05CRK00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70671083)、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项目号07200701)资助。

2 研究设计

人口流动带来了个体职业、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将发生改变。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均对流动后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

2.1 社会网络因素

社会网络是社会个体成员间因交往与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Mitchell, 1969)。借助于社会网络,个体可获得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获取有关工作、生活方面的指导、建议和信
息,从而对个体的观念产生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Shye et al., 1995)。同时,网络成员的观念与行为的示范作用会强化或改变个体的行为规范,使个体的行为在社会学习与社会影响过程中发生转变(Carrington, 1988;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Kohler et al., 2001; Montgomery et al., 2001; Ataca & Berry, 2002)。因此,流动后在社会网络成员(包括本地与非本地网络成员)性别偏好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会发生转变。

Bott(1971)指出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对个体观念的形成与变化具有重要影响。Granovetter(1973)根据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产生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而来。有学者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特征,将由“亲缘”和“地缘”为主的家属、亲戚和老乡构成的网络关系定义为“强关系”,由“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朋友、同事和老板等构成的网络关系界定为“弱关系”(Bian, 1997)。本文从性别偏好研究的角度认为,在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从事个体经营、商业或服务业、产业劳动者则在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农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形成了农民工的强关系群体,与农民工相似,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而职位层次相对较高的经理、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政府干部,在社会经济方面与农具有较大的差异,构成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弱关系,他们具有相对较弱的男孩偏好,对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更利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趋同于城镇市民。

2.2 流动因素

人口流动有利于个体观念与行为的转变(Lee and Farber, 1984; Goldstein et al., 1997)。一般而言,流动后个体的性别偏好既受流动前自身已形成的生育观念的影响,又会受流动后再社会化过程中自身对城镇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本文认为,人口流动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可以从初次流动时的年龄、流动后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和流动期间年返乡次数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依据Riley的年龄分层理论,由于家庭状况、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居住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制度等的差异,初次流动时不同年龄层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不同(Riley, 1971)。相对而言,未成年人对婚姻和生育等问题还处于概念阶段,男孩偏好较弱;而成年人,尤其是已婚群体,对婚姻家庭、子女价值等问题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与感受,在较长时期父权制的影响下,男孩偏好观念相对较强。因此,流动初始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工的男孩偏好强度不同,从而在流动时点基于年龄的差异产生了影响流动群体流动后至调查时点的性别偏好的队列效应(Hui et al., 2001)。流动后,在交往群体与流入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随着对流入地社会生活的适应,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会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影响个体生育观念的时期效应(Riley, 1971; Charlotte & Howard, 1992; Geoffrey, 2000; Hui et al., 2001; David & Christopher, 2003)。依据社会组织理论,进入组织时间较长的个体将对进入时间相对较短者产生较大的影响,而自身受进入组织时间较短者的影响也相对较小(Pfeffer, 1983)。相应地,在城镇社会中,具有相对较弱男孩偏好的城镇市民对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流动时间相对较长的农民工会对流动时间短的农民工产生

较大影响,流入时间越长,时期效应越强,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越趋同于城镇市民(Yu et al., 1996)。另外,由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大量季节性流动或短期返乡现象,并非永久性迁移(欧阳雪梅和谢海荣, 1996),地缘与亲缘的影响会使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阶段性地得到强化与恢复,不可避免地会对农民工生育观念向城镇社会的转化带来了负面影响。流动期间,年返乡频率越低,受乡村较强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越小,个体有男孩偏好的可能越低。

2.3 个体因素

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已有子女性别等个体因素会对个体的生育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生育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成正相关,除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外,小学、初中等其他文化程度妇女所生婴儿的性别比均普遍偏高;随家庭规模的扩大,已有子女的数量和性别会影响随后出生的婴儿性别,孩次越高出生的男孩相对越多(涂平, 1993; Zeng et al., 1993)。另外,个体因素还通过影响社会网络而对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间接产生影响(Fischer, 1982; Marsden, 1987)。

总之,流动后,随着在城镇滞留时间的延续,农民工与其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将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在分析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社会网络、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主要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4月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深圳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目前拥有103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16.5%,已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倒挂最严重的城市(杨敏, 2005)。因此,选取深圳作为外来农民工调查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以15周岁以上的聚居类和散居类农民工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聚居类人群指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工棚中的农民工,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较低;散居类人群指分散居住在市民小区中的农民工,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实地调查中,散居类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聚居类样本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个体基本信息、婚姻家庭信息、生育与养老的观念与行为信息,以及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信息。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实际支持网络、情感支持网络和社会交往支持网络(Van del Poel, 1993);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及子女教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经过数据录入、清洗,共收回有效问卷1739份。有关本次调查的目的、内容、执行和数据质量的具体描述请参见有关调查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2005)。

3.2 方法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主要从观念与行为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3.2.1 单变量分析。首先,利用“如果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您想怎么做?”所得到的信息,分析流动后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其次,利用个体自身或其配偶(女朋友)有关活产子女信息,确定流动后农民工的曾生子女性别比,并借助于卡方(χ^2)检验,判定该性别比是否偏离基准水平(105),分析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行为。

3.2.2 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3.2.2.1 因变量

在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采用Cumulative Logistic回归方法,利用“如果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您想怎么做?”所得到的信息,将农民工的性别偏好划分为三级:无男孩偏好(停止生育)、弱

男孩偏好(再要一个,不管男女)和强男孩偏好(不管怎样都要更多的孩子,直到有一个儿子为止),并分别赋值 1、0 和-1。分析中以无男孩偏好为基准。

在农民工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中,由于中国约有 2/3 的省区对汉族农村人口实行“第一孩为女孩可生育二孩”的政策,剩余省区则实行二孩政策而不考虑第一孩的性别(Peng, 1993);且现实社会中农业人口生育二孩者较普遍,生育多孩则受到严格控制,二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并与前次存活子女性别相关(高凌, 1993)。据此,本文认为已有一孩存活的情况下,第二孩的生育性别更能体现个体的男孩偏好特征。因此,在农民工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只对流动后二孩(一孩为流动前生育或流动后生育)生育性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中,采用二分 Logistic 回归方法,因变量为流动后生育子女性别,以女孩为基准。

3.2.2.2 自变量

依据本文的研究设计,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自变量均包括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控制变量为个体因素。

(1) 社会网络因素

社会讨论网注重于研究个人的意识行为如何受网络成员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网络影响其他个体(Marsden, 1987)。在本文的分析中,以农民工的生育讨论网为主确定社会网络因素,主要包括网络成员性别偏好观念的总影响效应和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

在社会网络中,个体与网络成员的亲密程度越高,其观念受网络成员的影响越大(Granovetter, 1973; Fischer, 1982)。本文利用农民工生育讨论网中网络成员对“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的态度,以相应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为权重,采用公式(1)加权计算网络成员对个体男孩偏好的总影响效应:

$$\text{个体男孩偏好的总影响效应} = \sum_{i=1}^n I_i \times A_i \quad (1)$$

在上式中, I_i 为第 i 个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划分为“十分亲密、比较亲密、一般、不太亲密和很不亲密”5 个等级,并分别赋值 5、4、3、2 和 1; A_i 为第 i 个网络成员对第一胎是女孩的态度,分为无男孩偏好(停止生育)、弱男孩偏好(再要一个,不管男女)和强男孩偏好(不管怎样都要更多的孩子,直到有一个儿子为止),并分别赋值 1、0 和-1, n 为网络成员数。回归分析中,将网络成员对个体性别偏好的总影响效应划分为无效应(加权值为零)、正效应(加权值大于零)和负效应(加权值小于零)3 类,以无效应为基准。

关于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利用生育讨论网中网络成员的职业信息,将职业为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当地工会干部、当地妇联干部、当地计生干部、当地政府干部、家乡政府干部的网络成员界定为弱关系,分析中划分为有弱关系和无弱关系两类,以无弱关系为基准。

在社会网络变量的测度中,在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将个体生育讨论网全部网络成员纳入分析范围以确定网络成员对个体男孩偏好的总影响效应和弱关系;而在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中,考虑男孩偏好观念与生育行为的时滞性,只纳入个体生育该孩前已认识的网络成员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效应(假定该网络成员在个体怀孕前的男孩偏好与调查时点一致),并依据这些网络成员的职业信息确定个体生育讨论网弱关系的有无。

(2) 流动因素

依据研究设计,流动因素主要包括农民工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和年回家乡的次数三个变量。流动因素为性别偏好观念与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的共有变量。

初次流动时的年龄,作为数值型变量。个体在城镇滞留时间(简称流动时间),在性别偏好观念影

响因素分析中具体指农民工首次进入城镇至调查之日止的时间长度,而在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则指个体首次介入城镇至生育该孩时的时间长度。在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将流动时间划分为不满1年、1~4年、5~7年、8年及以上4类,以不满1年为基准;而在流动后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中,将流动时间划分为4年以下、5~7年、8年及以上3类,以4年以下为基准。年回家乡的次数(假定个体流动后每年返乡次数无明显变化),划分为2次及以上、1次和不回去3类,以2次及以上为基准。

3.2.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个体因素。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和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共有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已有子女性别和流动前居住区域。其中:受教育程度作为分类变量,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及以上3类;已有子女性别,在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划分为无孩、只有女孩、只有男孩和男女孩均有4类,在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中划分为女孩和男孩两类;流动前居住区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类。另外,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增加性别和婚姻状况变量,婚姻状况划分为未婚和曾婚(包括初婚、再婚、离异和丧偶)两类。

4 分析结果

4.1 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分析

(1) 性别偏好观念

对于“如果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您想怎么做?”问题上所体现出的生育意愿,被访者中无男孩偏好者(选择停止生育)占37.1%,弱男孩偏好者(选择再要一个,不管男女)占55.9%,强男孩偏好者(选择不管怎样都要更多的孩子,直到有一个儿子为止)占7%,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中有强男孩偏好观念者相对较少。

(2) 性别偏好行为

表1提供了流动后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性别比的分析结果。

表1 流动后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性别比

内容	总人数(人)	男(人)	女(人)	性别比	95% 置信区间	卡方检验
总体	718	445	273	163.00	140.54~190.09	33.051***
胎次						
1胎	441	266	175	152.0	126.00~184.77	14.522***
2胎	224	144	80	180.0	138.16~239.68	21.891***
3胎及以上	53	35	18	194.4	114.05~371.32	4.832*

资料来源:中国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1的结果显示,虽然流动后农民工总体和分胎次的曾生子女性别比均在置信度为95%的临界范围内,但曾生子女性别比都显著偏离了性别比的正常水平(105),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农民工在生育行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尤其一胎性别比显著偏高,这与中国农村人口一胎性别比基本正常(楚军红,2000)并不一致,是否存在被访者瞒报活产女婴或流产等行为(Zeng et al., 1993;涂平,1993;高凌,1993),亦或受调查抽样与样本数的影响还需在后续做补充研究。

总之,通过对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曾生子女性别比的分析可知,流动后农民工生育观念与行为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特征。

4.2 城镇外来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流动后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和二孩生育性别为因变量,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分析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表 2 提供了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共有 4 个回归模型, 模型 1 和 3 分析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的影响, 模型 2 和模型 4 分析了社会网络、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的影响。4 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简要总结如下。

表 2 城镇外来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性别偏好观念回归 (B)		二孩生育性别回归分析 (B)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自变量				
社会网络因素				
网络成员对个体性别偏好的总影响效应(无效应)				
负效应(有性别偏好)	- 1.384***	- 1.183***	- 0.715	- 0.963
正效应(无性别偏好)	1.491***	1.313***	- 1.316*	- 1.354 ⁺
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无)				
有	0.534**	0.558**	- 0.081	0.579
流动因素				
初次流动时的年龄		- 0.018 ⁺		- 0.105*
流动时间(不满1年)				
1~4年		0.711*		
5~7年		0.590*		- 0.446
8年及以上		0.304		- 0.906 ⁺
年回乡频率(2次及以上)				
一年一次		0.067		0.190
不回去		0.190		- 0.623
个体因素				
性别(女)				
男		- 0.102		
婚姻状况(未婚)				
曾婚		0.151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65		1.086*
高中及以上		0.525**		1.108
已有子女性别(无孩)				
只有男孩		- 0.358		
只有女孩		- 0.631*		2.286***
男女孩均有		- 0.928***		
流动前居住区域(东部)				
中部		0.300*		- 0.032
西部		0.680***		- 0.126
- 2LL	146.119***	2170.167***	227.344	173.963***
样本数	1483		186	

数据来源: 同表 1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在表 2 中, 模型 1 分析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的影响, 结果表明生育讨论网网络成员的性别偏好和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对农民工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影响。网络成员总体上表现出

有男孩偏好(性别偏好总影响效应小于零)时,农民工有男孩偏好的发生比约为网络成员性别偏好观念总影响效应为零者的 $4(e^{1.384})$ 倍,而网络成员总体上表现为无男孩偏好(性别偏好总影响效应大于零)时,个体有男孩偏好的发生比仅为网络成员性别偏好总影响效应为零者的 $0.23(e^{-1.491})$ 倍;有弱关系的农民工有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约为无弱关系者的 $0.59(e^{-0.534})$ 倍。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结果显示除社会网络因素外,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产生了影响。流动后,初次流动时个体的年龄越大,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可能性越高;随着在城镇滞留时间的延续,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可能性下降。流动时间在 17 年者,有男孩偏好的风险约为流动不足 1 年者的 50% 左右($e^{-0.631}$ 、 $e^{-0.590}$);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有男孩偏好的风险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目前只有女孩和男女孩均有的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风险均显著高于目前无孩者,分别为无孩者的 $1.9(e^{0.631})$ 倍和 $2.5(e^{0.928})$ 倍;流动前居住在西部与中部的农民工,有男孩偏好的几率显著低于来源于东部的农民工群体。流动后年返乡次数并未对个体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影响。

模型 3 分析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二孩生育性别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二孩生育性别有一定影响,网络成员总影响效应为无性别偏好时有助于个体生育男孩风险的降低。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结果显示随初次流动时的年龄的增长个体生育男孩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流动时间在 8 年及以上群体二孩生育男孩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低于流动时间在 4 年以内的人群;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二孩生育男孩的可能性约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的 $2.96(e^{1.086})$ 倍;已有一女孩的农民工二孩生育男孩的几率约为已有一男孩者的 $9.8(e^{2.286})$ 倍。流动后年返乡次数并未对个体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5 讨论与小结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2005 年 4 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首先,在“第一孩为女孩时的态度”问题上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农民工相对较多;流动后农民工曾生子女性别比显著偏离了性别比的正常水平(105);胎次越高,曾生子女性别比越高。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

其次,本文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当生育讨论网网络成员对个体性别偏好的总影响效应表现为无男孩偏好时,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可能性降低,生育男孩的风险下降,相反,网络成员的性别偏好的影响将促进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风险上升;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将促使个体有男孩偏好的可能性下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效应会对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Carington, 1988; Shye et al., 1995;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Kohler et al., 2001; Montgomery et al., 2001; Ataca & Berry, 2002); 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群体更利于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的弱化。

再次,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初次流动时的年龄越大,流动后个体有男孩偏好的风险越高,一定程度上表明初次流动时点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队列效应,对流动后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了影响(Hui et al., 2001)。个体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对流动人口的性别偏好具有一定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个体在流入地社会生活的适应与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影响个体生育观念的时期效应(Riley, 1971; Charlotte & Howard, 1992; Geoffrey, 2000; Hui et al., 2001; David & Christopher, 2003); 流入时间越长,期间效应越强,男孩偏好会愈来愈弱化,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越趋同于城镇市民(Yu et al., 1996)。另外,流动 1 年后,流动时间对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即体现出来,而

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则在 8 年后才得以显现, 本文认为性别偏好行为的转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流动后经历相对较长的时间个体生育行为才会发生显著变化。初次流动时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具有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 但其生育男孩的风险却相对低于初次流动时年龄较小的个体。由此可见, 初次流动时年龄相对较大的个体, 在生育第二个活产子女时年龄也相对较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流动时间的延续, 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会愈来愈弱化。流动后年返乡次数对个体性别偏好并未产生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农民工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更多地受来自于城镇区域社会生活的影响。

最后, 个体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已有子女性别对个体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 男孩偏好风险越低, 但二孩生育男孩的可能性越大, 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涂平, 1993; 伍海霞等, 2005)。已有子女性别对性别偏好观念与二孩生育性别具有显著影响, 验证了二孩生育性别与原存活子女性别相关(高凌, 1993),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在无男孩时强烈偏好男孩, 在有一男孩时则期望儿女双全, 进而期望生育更多的男孩(李涌平, 1993; 风笑天、张青松, 2002)。流动前居住区域对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具有显著影响, 而对个体生育行为并未发生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农村地区存在性别偏好观念的差异, 但生育男孩仍然是农村人口的共同追求(穆光宗、陈俊杰, 1996)。

另外, 个体的文化程度、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和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也体现了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正是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对周围社会文化的反应与适应(Goldstein & Goldstein, 1982; Schmittker, 2002), 从而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初始的队列效应与流动后的期间效应而对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

同时, 本文研究还发现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致。本文认为个体的生育行为取决于宏观社会条件和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 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促进了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镇先进生育文化和社会网络中交往群体的示范作用对其生育观念产生了影响, 但在一定意义上并未从根本上满足或替代其世系继嗣、劳动力与养儿防老等现实需求; 加之社会交往、社会评价与社会支持等需求促使男性居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 生男仍是目前农村人口生育的核心追求(穆光宗、陈俊杰, 1996)。另外, 男孩偏好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仅包括流动后生育二孩(一孩为流动前或流动后生育)的已婚人群, 自变量、控制变量与样本数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

总之, 本文的研究发现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在城镇再社会化的过程中, 随着流动时间的延续, 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效应对流动后个体的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

本文的研究和发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动人口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进行了研究, 然而生育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动态变化的过程, 生育决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首先表现在生育数量选择的变化, 其次是生育时间选择的变化, 最后才是生育的性别偏好选择的变化(风笑天和张青松, 2002)。农民工的性别偏好态势还需要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结合农民工生育需求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另外, 在深圳所观测到的影响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因素, 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流动人口和流入地, 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楚军红. 我国农村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关系探讨.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 6
- 2 风笑天, 张青松.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 5
- 3 高凌.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 人口研究, 1993; 1

- 4 洪旺全. 深圳市流动人口生育行为影响因素调查及对策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杂志, 2005; 3
- 5 靳小怡, 彭希哲, 李树苗, 郭有德, 杨绪松.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 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人口与经济, 2005; 5
- 6 李涌平. 婴儿性别比及其和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 普查的结果和所反映的现实. 人口与经济, 1993; 4
- 7 穆光宗, 陈俊杰. 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人口研究, 1996; 3
- 8 欧阳雪梅, 谢海荣.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问题初探.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
- 9 涂平. 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探讨. 人口研究, 1993; 1
- 10 尤丹珍, 郑真真.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 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2; 6
- 11 伍海霞, 李树苗, 杨绪松.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性别比- 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05; 6
- 12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报告. 2005
- 13 杨敏. 深圳年度事件: 深圳人口突破千万. 2005
http://city.sz.net.cn/city/2005-12/29/content_178177.htm
- 14 杨绪松, 李树苗, 韦艳. 浦东外来农村已婚妇女的避孕行为- 基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视角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 15 杨琰, 武俊青, 陶建国, 高尔生. 已婚流动妇女的婚姻及生育状况分析. 中国计划生育杂志, 2002; 11
- 16 Ataca, B., & Bery, J. W. 2002. Psychol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marital adaptation of Turkish immigrant coupl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 13- 26
- 17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81- 1005
- 18 Bongaarts, J. & Watkins. S. C. 1996.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ontemporary fertility transi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 639- 82
- 19 Bott E. 1971.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roles, norms,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in ordinary urban famil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20 Carrington P. 1988. Network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Wellman & Berkowitz (ed.)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New York
- 21 Charlotte S, Howard S. 1992. Young white adults: Did racial attitudes change in the 1980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2): 340- 367
- 22 David J Harding, Christopher Jencks. 2003.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 sex: Cohort, period, and aging effec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7(2): 211- 226
- 23 Eklund, L. 1999. Gender roles and female labor migration: A qualitative field study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Report from a Minor Field Study: May- July
- 24 Fischer, Claude S. 1982.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similarity among associ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6): 797- 801
- 25 Friedkin, Noah E., Johnsen, Eugene C. 1997. Social positions in influence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9: 209- 222.
- 26 Geoffrey Carliner. 2000.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U. S. immigrants: Assimilation and cohort e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4(1): 158- 182
- 27 Goldstein, S. & Goldstein. A. 1982. Technique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Chapter 5 in *National migration surveys X. Guidelines for Analysi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32- 162.
- 28 Goldstein, A., White. M. J. and Glodstein. S. 1997.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Demography* 34: 481- 492
- 29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30 Hui Chuan Hsu, ChinYin Lew Ting, and Shwu- Chong Wu. 2001.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on the Attitude toward Supporting Parents in Taiwan.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41: 742- 750
- 31 Katz, E. & Lazarsfeld, P. F.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 32 Kohler, H., Behman J. R. and Watkins. S. C. 2001. The densit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 south Nyanza district, Kenya. *Demography* 38(1): 43– 58
- 33 Lee, B. S. and Farber, S. 1984. Fertility adaptation by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of Korea. *Population Studies*, 38: 141– 156
- 34 Mauds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 35 Mitchell, Clyde. J. 1969.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situations, edited by J. C. Mitchell. Manchester, E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36 Montgomery, M. R., Kiros. G. E., Agyeman D. and Casterline. J. B. 2001. Social network and contraceptive dynamics in south Ghana. Policy Research Division Working Paper, 153
- 37 Peng, X. 1993. Regional differential in China's fertility transition. *The Revolution in Asian Fertilit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38 Pfeffer, J. 1983. Organizational demography. In L. Commings and B. Staw(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vol. 5. JAI Press, Greenwich, CT
- 39 Riley, M. W. 1971. Social gerontology and the age stratification of society. *The Gerontologist* 11:79– 97
- 40 Sara R. Curran and Abigail C. Saguy. 1997. Migra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A role for gender and social networks?. Presented to the Culture and Inequality Workshop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 41 Schnittker, J. 2002. Acculturation in context: The self– esteem of Chinese immigran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5(1): 56 – 76
- 42 Shye D, Mullooly J. P, Freebom DK, Pope CR.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mortal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n elderly cohor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1(7): 935– 947
- 43 Van del Poel.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Forces* 15: 49– 70
- 44 Yu, P., Berryman, D. & Berryman, L. 1996.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 esteem, acculturation, and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of recently arrived Chinese immigrant adolescents.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8(4): 251– 273
- 45 Zeng, Y., P. Tu, B. Gu, Y. Xu, B. Li . Y. Li. 1993.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 and implications of recent increase i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5(2): 333– 337

Social Network and Son Preference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 Study in Shenzhen

Abstract: Using sample data from a survey of temporary immigrants in Shenzhen conducted by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April 2005,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son preference among the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a framework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It is revealed that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hildbearing among these rural– urban migrants exhibit strong son preference. Social networks, migration histor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have effects on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concerning son preference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The findings ma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ncreasing sex ratio at birth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Key words: Urban– rural migrants; Son preference; Sex ratio; Social network

Authors: Li Shuzhuo is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u Haixia is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Jin Xiaoy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Marcus W. Feldman is Professor, 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